

杰克兰达宾馆

◎ 杨晓晖

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把奖杯颁给加拿大作家艾丽丝·门罗，再一次显示此奖的两大特点：第一，属于意外之中的“意料”。绕过呼声很高的村上春树等三位候选名作家，让主创短篇小说的门罗荣获殊荣。而门罗获得过诸多欧美英语文学的重要奖项，再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。第二，制造某种令人激动的传奇色彩：高龄可以再创辉煌。82岁、在偏远小镇寂寞写作的门罗，如今在一夜之间成为加拿大的骄傲、加拿大的国宝，这对全世界广大平凡的女性，算得上是一个励志性的故事。

《逃离》是目前唯一一本门罗的中文译本小说集。巧的是，今年7月张悦然主编的《鲤·旅馆》，选了一篇门罗的小说。最新读到的中文译本门罗短篇，就是《杰克兰达宾馆》。它显示着门罗作品的经典风格：既简洁又深邃，既清晰又悬疑。

开服装店的中年女人盖尔在情人威尔离开她之后，觉得生活似乎没有了意义。威尔从事戏剧教育，来店里制作戏衣，盖尔和他相

识。“盖尔喜欢看他排练，或者和学生说话。他做导演时是那么娴熟无畏，走过学校大门或者沃利的街道时是那么气宇轩昂。还有他对她所怀有的那种稍显古怪的倾慕之情，他那种爱人般的殷勤礼貌，他家充满的愉快的异国情调……”威尔来自土耳其的另一个戏剧人桑迪相爱了，并跟随她去了澳大利亚。

小说的开头写的正是盖尔乘坐坐在飞往悉尼的飞机上的场景。盖尔在威尔的母亲那里看到了威尔信封上昆士兰州的地址。她把店卖了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，从头发到衣裳。盖尔租住的米拉马尔公寓距离威尔所在的街道大约只有一英里。盖尔只去过一次，就再也没有去过那条路。小说的戏剧性与绝妙，是这样的情节构筑：盖尔从威尔的信箱里拿走了一封退信，是威尔写给一位他自以为是

的澳大利亚表姐，要求相聚一谈。而事实上那位老妇人已经去世。盖尔从信的字里行间，臆想威尔与桑迪相处不快，以致于要寻找新的兴奋点。“桑迪和她那些年轻朋友都充满了强烈的自信，他们那种粗鲁的正义感可能会让威尔很痛苦。他的智慧不受注意，他的热情显得过时，他根本无法融入他们之中。与桑迪在一起的骄傲已经逐渐变了味儿。”盖尔冒充已故的索纳比女士，与威尔通起了信。直到有一天威尔来找写信人索纳比女士，发现她早已死亡。

“盖尔，我知道是你。”盖尔的租屋里躺着威尔的便条。

“我能从锁眼里闻到你的味道。是你，盖尔！”盖尔想象中威尔说的话。

盖尔退了租屋，再一次选择逃离。

“最想听到的话是会变的。当你在等待的时候，它们会发生某些变化。爱——需要——原谅。爱——需要——永恒。这些话听起来变成了街上的喧闹声、敲击声、捶打声。你所能做的就是逃走，这样才能不习惯于敬仰它们。”

在机场商店，盖尔买了一个澳大利亚土著做的小盒子，或许给威尔做礼物。

“现在，要不要追随我，由你来决定。”

小说的结尾忽明忽暗，充满喜剧般的悲伤，或者是带泪的笑。爱的心痛，生活的挫意，完全以空灵的笔触来表达，自然天成的细节里富有幽默，细细咀嚼，这幽默里又满是辛酸……大师善于以温情写极端。

时报出版的中文繁体版《出走》，其译者、作家张让在译序里

这样评价门罗：“故事性和画面性很强。悬疑迫使你盯紧书页跟下去，因为你已经化为里面的人物，随她（通常是她）期待和煎熬。你充满了恐惧等候，然后在关键时刻，以自己的意志试图扭转现状。未知的暴力在这里，不是人身伤害，而是那种将你吊在火上烧烤的无情——门罗写的，正是人生处处这种如刀俎的无奈和对那无奈的反抗。生命的奋争不是走上战场在炮火中冲锋陷阵的英勇，而是面对似乎无可转寰的现实做飞蛾扑火的投掷。现实必然反扑，许多人成了炮灰，有的人却由炭成了煤——门罗笔下便有不少这样的人，愈烧愈炽。”

杰克兰达是盖尔苦闷散步时路过的宾馆旁边树的名字。那宾馆就是杰克兰达宾馆。杰克兰达的树开满了花，“那是一种泛着银光的蓝色或者紫色，那么雅致那么美丽，你简直觉得它能将一切归于平静、归于沉思，但显然它没有做到。”门罗的这个小说名字也富有意味。

让步也是一种智慧

◎ 康伟明

《让步心理学》的理念属于“逆袭式”，突破了传统的“竞争式”的模式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从人们容易遗忘的角度出发，并以洞悉心理为轴线，以串珍珠的方式将一系列的让步心理巧妙地串在了一起，由浅入深地教人们如何瞬间解读对方行为背后的心理。让步绝不等于妥协，很多时候让步只是为了为下一次的冲锋而积蓄力量，让下一次的出拳更干净利落。另外，该书详细解释了“等门槛效应”、“超限效应”、“吃亏定律”和“U型思维”等，让你全面了解“让步”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的种种心理。在对弈的时候，从对方的言语和行为揣摩出对方的心理，占尽交往主动权，可以让自己寸土不让，也可以让自己以退为进。

老子曾说过“反者道之动”，黑格尔也曾说过“事物的发展包含它的否定”。两位先贤无非是洞悉了事物发展“物极必反”的规律。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，如果过分追求某事某物，不懂得掌握好临界点，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懂得及时作出适当的退让，眼前的路也许就顺畅多了。《让步心理学》这本书分为十个章节，每个章节都以“掐准时机让步”为出发点，从十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“让步”哲学在生活当中的应用。

螺旋的前端

——简评王琪森新著《海派书画艺术散论》 ◎ 胡晓军

王琪森先生的学术研究，是从书画发轫的——从创作到理论、从人物到风格、从大师到精英、从鉴赏到收藏等。既然一艺通则百艺通，那么一理通也百理通，在对中华艺术作出从古到今的系统梳理和独到研究后，他于1999年撰写了《中国艺术通史》。由于他的研究重点仍为书画，加之痛感于“海派书画的长期受冷落、被忽略”，琪森先生又于2007年出版了专著《海派书画》，从历史、经济、文化三个层面对三代海派书画大师及群体，作出文化社会学和艺术经济学的探究。

如果以此背景读这本刚出版的《海派书画艺术散论》，便能觉出不一般的意涵。原来，他是从微观的书画研究出发，在对中华艺术形成历史整体思考、得出系统框架理论之后，再以专论、散论的形式重观微观，为海派书画淘洗尘沙、研磨剑戟。用他的话说来，

是“探幽抉微、以为更深和更透切的发现”。我觉得，但凡学术问题，欲达全面系统而又科学深邃的境界，就应至少经历一个过程，即先从微观扩至宏观，再由宏观收至微观，学者犹如操纵一架微距与广角兼备的相机，又像完成一个螺旋式的行进——前期的书画论文是螺旋的发端，《通史》和《海派书画》是螺旋的中段，而《散论》则是螺旋的前端。应当讲琪森先生对海派书画所作的历史开掘与艺术探索，开辟了一个学术新领域。

琪森先生是以经济形态和艺术生存方式，切入对三代海派书画及文化的研究。他认为，独立的人格离不开独立而强大的经济支撑，独立的艺术创造及其精神，亦当如此——“首先是生活之人，然后才是艺术之人”。此见深合我意。我也曾将商业性、平民性以及两者合力所形成的竞争性，作为海派艺术和文化的基石，并由

此推断当代海派文化存在基础的缺失和内在的危机。只是我参考的是戏剧、倚仗的是粗疏的观感和依稀的直觉；而他精研的是书画，依凭的是细腻入微的考据和鞭辟入里的论证。用心更良苦的，是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发现，而是在努力唤起人们的重视。在坚守道德底线、追求学术品格和提升精神价值的同时，琪森先生显示出当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关注历史、思考现实、寻求发现的智慧和行为。

这一轮螺旋式行进，大约花了二十年时间。当完成时，琪森先生已近六旬。他不仅将这本《散论》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，更为海派文化研究的未来构建了平台、送出了祝福。最近，琪森先生正为大学撰写《海派文化概论》一书，此书作成，有望成为高等院校的第一本海派文化教科书。



《潮涌镇海》赵笑平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是身为企业家的作者的诗文集，他写祖国的山川风景，写自己生活的城市，写喜爱的偶像与熟悉的朋友。蕴涵激情，语言优美。那联排擎天大树，在这里寂静肃立，风儿在耳畔呢喃，它们都已整整——站立数个世纪——书中展现出的岁月沧桑让读者共鸣，而一些写人写景的抒情诗既表现出作者感情的深沉，又具有某种特创的表达。



《车轮上的名人》，钱承飞著，文汇出版社出版。作者以新闻的敏锐和独特的视角，采访了“驾车族”中近百位名人，写的是车轮上的名人品格。他们分布在各个界别，既有作家、画家，又有导演、演员，还有电视台节目主持人、功勋运动员，他们叙述如何买车、开车、修车的生动故事。作者在书里绘声绘影，惟妙惟肖，写出了名人开车的技巧、心理活动，趣味横生。

毛姆喜欢旅行。他曾两次去马来亚等地区，生活了10个月，写下了一本脍炙人口、充满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的短篇小说集《木麻黄树》。其实，在他第一次去马来亚等地之前，即1919年到1920年冬季，45岁的毛姆来到中国，溯长江而上1500英里，《在中国屏风上》就是他此行的产物，58篇或长或短、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“素材”，连缀成“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”。也正因为如此，《在中国屏风上》很少雕饰，保持了最初写作时的鲜活与质感。

在毛姆的眼中，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、古老神秘的国度，同时又是一个愚昧专制落后的所在。他赞美长城的“巨大、雄伟、令人敬畏”，“静静地耸立在薄雾之中”；赞叹最贫穷的村庄里农家简朴的门上那可爱的雕刻，窗户外花格所构成的复杂而优美的图案，还为一个法国医生收集到的古希腊风格的武士塑像兴奋不已，因为这让他推想亚历山大帝的大帝的马其顿军团远征印度时，可能沿着雪山进入了中国西藏，从而留下了两种文明交汇的遗物。中国普通民众的吃苦耐劳也让他

毛姆的中国视角

◎ 刘蔚

印象深刻。长江上纤夫们拉船时喊出的高昂有力的号子令他震撼，他不由得称赞这江中号子表达的“人类战胜无情的自然力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”，也对赤脚裸身、汗流浃背的纤夫们那痛苦的呻吟中传递的“人性最沉痛的啜泣”，寄予了真切的同情。至于山坡上丢弃婴儿的小塔，抨击人心不古、礼崩乐坏，雅好古玩却又虚伪贪婪、聚敛财富的“内閣部长”，精通多国外语、学贯中西、高谈阔论，同时沉湎于花街柳巷的哲学家，则为上世纪20年代战乱贫困的中国留下了一幅幅古怪陆离但真实度颇高的剪影。

毛姆的中国之行时间并不长，这决定了他难以深入地接触中国人，对中国人生活的了解十分有限；况且他的读者对象是英国人，因此，他的笔触更多地落到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英国人身上。那位在辛亥革命期间去交涉侨民安全事务的传教士，在去衙

门的路上奋不顾身地救下了被行刑队押往刑场即将枪决的三位战俘，显示了他的勇气和入道思想。住在临江的一幢漂亮房子里的海关专员范宁，对待他的中国下属盛气凌人、粗暴严厉，但她的夫人却热情好客、善解人意；而把他们与万里之外的家乡联系起来的纽带，则是留声机中播放的伦敦音乐喜剧的最新歌曲，他们的思乡之情也在那音乐声中得到了宽解和慰藉。

由于对自己的英国同胞更加熟悉，毛姆在描写他们的中国生活时不全是欣赏，更多的是以冷峻的幽默、犀利的文笔，对他们人性中的虚伪、贪婪和自私毫不留情地进行嘲讽。那位被妻子称赞为“听不得了一个字说中国人不好”的传教士温格罗夫先生，当看见一个中国女子进来时，脸上却露出了极为厌恶的表情，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他的感官所喜爱的，他的灵魂就厌恶。”以“社会主义者”自居的亨德森，刚到上海时

拒绝坐黄包车，因为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，但很快他便原形毕露，声称不必关心中国人，“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。我们是统治的民族”；他刚才还在大谈特谈罗素的新著《自由之路》，却因为车夫错过拐弯口而破口大骂，狠狠地踢了车夫一脚。那位貌似威严、看重荣誉的斯特韦尔德先生，每当他年轻的太太找了个新情人，就会要求岳父母给他一大笔钱作为补偿；毛姆调侃他“已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，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，他无疑会成为富翁”。

《在中国屏风上》展现了中国的的风土人情，也勾勒了英国人在中国的生活。然而，屏风有一种遮蔽、隔断的功能，它“隔”在毛姆与现实的现实之间，难免使他雾中看花，以表为里，产生误读和错觉。在他的笔下，中国的鸦片馆干净明亮、舒适温馨，“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，每天晚上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那里享受安逸的时光”。荼毒人的灵魂的阴暗处简直成了人间天堂。

像间谍一样思考

卡尔森曾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搜索团队的一员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工作。她没想到的是，从中情局获得的技能能够直接适用于企业。于是写作了《像间谍一样思考》这本书。书中写到：企业可以从间谍那里学到很多东西——不只是如何应对危机，还有如何实现卓越运营。 中信

